

一个词语的出处,往往有几种说法,作者经研究又提出了另一说:

## “买东西”一语可能出自越南

□胡文炜

1933年,孙伏园写过一篇《绍兴东西》,很有趣味性。他在开头写道:“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林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的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及别处人。”挑贩卖的是物资,需要他的物资者是向他买。那么为什么物资买卖要说“买东西”、“卖东西”?“东西”,肯定指的是方位。最初的意思大概是到东边或西边去买。简称“买东西”,那为什么偏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呢?一般有两种解释:

一、唐朝时,都城长安有两大市场,以经营服饰和金银珠宝为主,十分繁荣,这两个市场一个习惯称东市,一个称西市。人们到东市买过后,总要再到西市去一下。后来不管买什么。也不管到哪里去买,都称买东西了。

二、南宋学者朱熹去看望朋友盛温如,正好盛拿了篮子到街上去。朱熹问他去干什么,盛答“买东西。”朱熹问为什么不是买南北,温答五行中东方是木,西方是金,可以用篮子装,西方是火,北方是水。篮子不能装,也就不能买。张岱的《快园道古》也有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买卖东西的来历。原文是:“虞德回问莲池大师曰:‘俗言买东西。不言买南北,何也?’师即应声曰:‘南方主火,北方主水,水火家家具足,故不必买,东方主木,西方主金,金木人人所无,安得不买?’”莲池大师也是明朝人,在年代略早于张岱。

“买东西”出于唐代市场或宋代五行,总使人觉得好像晚了一点,其最初源头可能还在越王句践时期。《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涂,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从地形看,越地南面是山;北面是钱塘江口(海),且有敌国,有战争,可以施展的是东与西两翼。句践事吴三军后归国,大夫范蠡建城作为国都,宫室在今府山。越王台坐北朝南,人朝南坐,左右两手各分东西,左手一指“买东”,右手一指“买西”,买物也就叫“买东西”。富中大塘、鹿山、鸡山、狗山、豕山、铜牛山、炭山均在东侧。西面不仅有大片农田,而且出人,出美女。故叫西施(东施是后来庄子为阐述事理而编的)。正因为对“东”与“西”有好感,所以买物称“买东西”。其实《越绝书》中也有南火北水之说,此书卷六伍子胥就说“越在南,火;吴在北,水。”火与水当然不好买。

将“买东西”的来历说是出于越国时期,这当然是一种推测。但是说出于长安两市和阴阳五行,同样也是推测,不是定论。既然如此,多一种推测又有何不可呢,何况出于越国时期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 陆游《梅花绝句(之三)》赏析

□午坐

闻道梅花晓坼风,雪堆满遍四山中。何方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据李易《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梅花绝句》是陆游在嘉泰二年(1202)正月初在山阴作,共六首,此诗为第三首,表达了陆游对梅花无比喜爱的感情。

此诗主要叙写梅花开放的信息和盛开的形态。听说梅花在晓风中开放,梅花盛开的形态以雪堆来形容,可见梅花之多之猛,而且开满四山。

岁岁重阳又临重阳,重阳缘何有登高远眺、观赏菊花、吃重阳糕和遍插茱萸等风俗——

# 重阳节习俗溯源

□毛文君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庆祝重阳节的多彩浪漫,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另外,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后来重阳节被立为老人节。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重阳节登高呢?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当地青年恒景见此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山,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瓶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

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瘟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一书里曾有此记载。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

重阳节里,人们还有吃重阳糕的风俗。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绍兴民间的重阳糕朴实而多含义:其时,正是五谷与枣、栗等收获登场之际,越人就用新碾米粉和以枣、栗等制作重阳糕,至多在糕上插几面彩纸小旗,以享受劳动成果和表达丰收的喜悦。不过,绍兴重阳日还有个习俗,天将亮,用一块糕搭在小儿头上,并祝祷道:“百事皆高”。“糕”与“高”同音,讨口彩,图吉利。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

赏菊并饮菊花酒也是重阳节的一个风俗。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

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兴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绍兴重阳节的民俗,随着时代不同,有所变更。南宋(嘉庆会稽志)载:“重九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时至今日,绍兴重阳登高与食糕两俗仍盛行。

## 古避塘

避塘位于绍兴狭湖塘,嘉庆《山阴县志》:“明天启中,有石工覆舟,遇救得免。遂为僧,发愿誓筑石塘。十余年不成,抑郁以死。会稽张贤臣闻而悯之,于崇禎十五年建塘六里,为桥者三,名曰天济,盖罄资产为之,五年而工始竣。”今塘基本保持清代原貌。全长3.5公里。塘基以条石垒叠,上铺长约2米青石板。每隔里许筑一石拱桥,全段计5座,并建有石路亭一座。

### ■越地古迹



## 范蠡救儿的故事

□谢木兰

范蠡的一生,聪明精练,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公。

这故事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入了大牢。他派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上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对此,大儿子很有意见,认为父亲分明是看他没有出息,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

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只好勉强同意老妻去。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以后,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请他帮忙,千万不要过问。”

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放,也不要问所以然。”可

是,这个大少爷不听劝告,又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楚国一个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

这个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重他;他也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而准备时后归还。这些情况,范少爷哪里知道。

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晋见楚王,谎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任庄生,问其解救之法。庄生说,唯施德政可以除之,于是楚王决定大赦囚犯。赦令尚未正式颁布,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知,告诉大少爷,说他弟弟得救了,国王马上就要下达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释放,何必白白将千金送给庄生。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释放了;故此,特来告辞。”庄生明白

其来意,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钱,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

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便再次晋见楚王说:“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大王行赦令是因为天下巨富范蠡的儿子杀人被困,还说大王有受贿之嫌。”楚王大怒,决定先杀范蠡之子,再下赦令。最终,大少爷只能哭哭啼啼带着兄弟的尸体回家。

全家人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兄弟才回来,他并非不爱兄弟,而是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泊,得知财富得之不易,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子出生后,就在富贵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要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如此,这是事理自然;目前,杀人二儿偿命,也是法理使然。”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可称古今一绝。

## 周恩来挽蔡元培联

□冯文栋

1940年3月4日,人民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不幸病逝。噩耗传出,全国各界为之震惊和痛惜。为此,周恩来特撰写了一幅挽联。其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联语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且高度概括了蔡元培先生一生中光辉伟大的功绩。

## 绍籍著名女作家茹志鹃

□郭静然

茹志鹃(1925—1998),当代著名军旅女作家,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绍兴柯桥茹家楼。1925年农历9月13日(阳历10月30日)生于上海。

茹志鹃出生于贫困家庭,祖上经营生丝行业,后没落为城市贫民。3岁时亡母,父弃家出走,家庭败落,全家成员星散,茹志鹃随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靠做手工活换钱为生。13岁那年祖母逝世,孤苦无依,曾被送入上海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以后又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先后加起来,读书不足4年。1943年在上海颐生小学任教半年。第一篇作品《生活》发表于1943年11月22日《申报》副刊。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1955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3月发表歌颂军民血肉关系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被茅盾誉为他最近读过的几十篇作品中使他满意和感动的一篇,并赞赏了作品独特的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从此,声名鹊起,一举成名。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文革”中,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1977年发表小说《出山》,重新开始创作。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其中对历史现实进行反思,批判极“左”路线的作品《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10月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终年73岁。

茹志鹃的创作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擅长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进入新时期以后,视野变得更加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黄秋耘语),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诸多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丹戈评),创作风格有所发展。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等老一辈作家、评论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主要作品集有:短篇小说集《关大妈》、《黎明前的故事》、《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长篇小说集《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集《惜花人已去》等。